

• 心理卫生评估 •

中学生的抑郁症状与生活事件： 非适应性策略的中介作用^{*}

陈海燕 姚树桥 明庆森 侯婵娟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学心理研究所,长沙 410011 通信作者:姚树桥 shuqiaoyao@163.com)

【摘要】目的:探讨中学生的非适应性策略在抑郁症状与负性生活事件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从全国10个城市抽取7110名(男生3486人,女生3624人;高中3496人,初中3614人)中学生,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和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评定中学生的抑郁症状、负性生活事件应激值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并采用路径分析评估非适应策略的中介效应。结果:中学生的CES-D平均分为 (17.0 ± 9.2) ,抑郁症状检出率为37.0%。男生和女生的ASLEC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0.5 \pm 20.0) \text{ vs. } (30.5 \pm 18.9), P > 0.05]$,高中生的ASLEC得分高于初中生 $[(33.9 \pm 19.6) \text{ vs. } (27.3 \pm 18.6), P < 0.01]$ 。CERQ-C的非适应性策略得分为 (38.6 ± 10.4) ,与CES-D得分和ASLEC得分三者之间呈中度正相关($r = 0.40 \sim 0.48$,均 $P < 0.05$);且非适应性策略在抑郁症状和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12, $P < 0.05$)。结论:本研究提示,中学生的抑郁症状可能与其经历较重的负性生活事件相关,而对负性生活事件的非适应性策略可能有一定程度的中介作用。

【关键词】 中学生;抑郁症状;负性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中介作用

中图分类号:R74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2)010-0786-05

doi: 10.3969/j.issn.1000-6729.2012.10.013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2 26(10):786-790.)

Depressive symptom and life events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diating role of maladaptive strategy

CHEN Hai-Yan, YAO Shu-Qiao, MING Qing-Sen, HOU Chan-Juan

Medical Psychological Institute, the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1,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Yao Shu-qiao, shuqiaoyao@163.com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maladaptive strategy between depressive symptom and life events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Totally 7110 middle school students (3486 males, 3624 females; 3496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3614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ten cities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assessed with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for depression symptom, 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 (ASLEC) for the evaluation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th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hinese Version (CERQ-C) for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aladaptive strategy was calculated by path analysis. **Results:** The mean score of CES-D was (17.0 ± 9.2) , the rate of depressive symptom was 37.0%.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in the ASLEC scores $[(30.5 \pm 20.0) \text{ vs. } (30.5 \pm 18.9), P > 0.05]$, but th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cored higher tha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33.9 \pm 19.6) \text{ vs. } (27.3 \pm 18.6), P < 0.01]$. The score of CERQ-C maladaptive strategy was (38.6 ± 10.4) .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s among the scores of CERQ-C maladaptive

*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009BAI77B02)

strategy, CES-D, and ASLEC ($r = 0.40 - 0.48, P_s < 0.05$). In addition, the maladaptive strategy functioned as a mediator between depressive symptom and negative life events,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0.12 ($P < 0.05$). **Conclusion:** It suggests that the depressive symptom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the maladaptive strategy might play a mediating role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Key word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depressive symptom; negative life events;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mediating effect

(Chin Mental Health J, 2012, 26(10): 786 - 790.)

Garnefski 认为,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是指个体为适应内外环境要求以及有关的情绪困扰而做出的认知努力, 他提出了 9 种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分为两大类: 适应性和非适应性策略^[1-2]。适应性策略, 类似于积极或成熟应对方式, 理论上包括以下 5 种策略: 接受、积极重新关注、理性分析、积极重新评价和重新关注计划。非适应性策略包括以下 4 种策略: 责难自己、责难他人、灾难化和沉思, 与负性情绪呈正相关, 类似于消极或不成熟应对方式。以上 9 种策略具体是属于适应性还是非适应性策略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因为同一种策略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负性生活事件具有不同的作用。罗伏生等人^[3]的研究结果发现, 大学生越倾向于使用接受策略, 报告的抑郁症状就越多。因此, 可以将本研究中的非适应性策略定义为与抑郁症状呈显著性正相关的策略。

一般而言, 人们在经历生活事件之后, 较少使用非适应性策略, 而更多使用适应性策略, 但是非适应性策略与心理健康或负性情绪(如抑郁、焦虑等)的关系却更为密切^[1, 4]。到目前为止, 国外没有非适应性策略在中学生生活事件和抑郁间的中介作用的研究, 而国内有少量研究。魏义梅^[5]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 有三条路径影响大学生的抑郁: 即生活事件→抑郁; 生活事件→积极应对→抑郁; 生活事件→消极应对→抑郁。刘启刚^[6]等人则发现, 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生活事件和大学生心理健康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而积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没有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 国内多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应对方式在生活事件和抑郁间的中介作用, 而以全国性中学生为样本的研究少见。并且, 已有研究发现, 非适应性策略与抑郁关系更为密切。因此, 本研究主要探讨非适应性策略在中学生生活事件和抑郁间的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0 年 10 月 - 2010 年 12 月, 采取整群抽样方式, 在长沙、杭州、彭州、三台、广州、廊坊、苏州、银川、沈阳和沧州 10 个城市中分别选取中等水平的初中和高中学校各 1 所, 抽取初一到高三 6 个年级各 3 个班。以班为单位, 共 7110 名初一到高三的学生接受了评定。男生 3486 人, 女生 3624 人; 年龄 11 ~ 20 岁, 平均年龄 (15 ± 2) 岁; 汉族 6712 人, 其他民族 398 人; 初中生 3614 人(初一 1427 人, 初二 1266 人, 初三 921 人), 年龄 11 ~ 17 岁, 平均年龄 (14 ± 1) 岁; 高中生 3496 人(高一 1410 人, 高二 1208 人, 高三 878 人), 年龄 14 ~ 20 岁, 平均年龄 (17 ± 1) 岁。

1.2 工具

1.2.1 流调中心抑郁自评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7]

由 20 个条目构成, 根据最近 1 周的感受进行 0 ~ 3 分的 4 级评分。4、8、12、16 为反向计分条目。20 个单项分的总和为统计指标, 总分 ≤ 15 分为无抑郁症状; 16 ~ 19 分为可能有抑郁症状; 总分 ≥ 20 分为肯定有抑郁症状。

1.2.2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 ASLEC)^[8]

由 27 项可能引起青少年生理心理反应的负性生活事件构成。根据事件发生时的心理感受进行 5 级评分, 生活事件总应激值为各项事件评分之和。分数越高, 应激越大。本研究评定期限为最近 1 年。

1.2.3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hinese Version, CERQ-C)^[9]

评估青少年在应对负性事件时使用的认知策略。有 36 个条目, 9 个分量表: 接受、积极重新关注、理性分析、积极重新评价、重新关注计划、责难自

己、责难他人、灾难化、沉思。前面 5 种属于适应性策略,后 4 种属于非适应性策略。在某个分量表上得分越高,在应对负性生活事件时个体就越有可能使用这个特定的认知策略。

1.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计数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对计量资料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Pearson 相关分析、层次回归分析,使用 Amos7.0 对计量资料进行中介分析。

2 结果

2.1 男生与女生、高中生与初中生的抑郁症状检出情况及 ASLEC、CERQ-C 的得分比较

中学生的 CES-D 平均分数为(17.0 ± 9.2)。男

生的 CES-D 总分低于女生,高中生高于初中生。无抑郁症状的中学生占 47.3%,可能有抑郁症状的占 15.7%,肯定有抑郁症状的占 37.0%。男生和女生的 ASLEC 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高中生的 ASLEC 总分高于初中生。中学生在 CERQ-C 中得分较高的策略依次为重新关注计划(12.0 ± 4.3)、积极重新评价(12.0 ± 4.2)和接受(11.9 ± 3.9),得分较低的策略是灾难化(8.0 ± 3.7)和责难他人(8.8 ± 3.4)。高中生在 CERQ-C 的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和接受上得分低于初中生,在积极重新关注、理性分析、责难自己、沉思、灾难化和责难他人得分上高于初中生。男生的 CERQ-C 责难自己和沉思得分低于女生,灾难化得分高于女生($P < 0.05$)。

表 1 男生与女生、高中生与初中生的 ASLEC、CERQ-C 和 CES-D 得分比较($\bar{x} \pm s$)

项目	男生 ($n=3486$)	女生 ($n=3624$)	t 值	P 值	高中生 ($n=3496$)	初中生 ($n=3614$)	t 值	P 值
CES-D 总分	16.3 ± 9.0	17.6 ± 9.4	-5.80	<0.001	18.5 ± 8.7	15.5 ± 9.5	13.89	<0.001
ASLEC 总分	30.5 ± 20.0	30.5 ± 18.9	-0.03	0.976	33.9 ± 19.6	27.3 ± 18.6	-14.58	<0.001
CERQ-C								
总分	97.6 ± 19.6	98.1 ± 17.6	-1.05	0.294	99.4 ± 10.7	96.4 ± 23.8	6.92	<0.001
接受	11.9 ± 4.0	11.9 ± 3.7	0.70	0.484	11.3 ± 3.5	12.5 ± 4.1	-13.99	<0.001
积极重新关注	11.7 ± 4.0	11.7 ± 3.7	0.66	0.511	11.9 ± 3.6	11.5 ± 4.0	5.27	<0.001
理性分析	11.7 ± 4.4	11.6 ± 4.2	0.94	0.348	14.4 ± 3.0	9.0 ± 3.6	68.02	<0.001
积极重新评价	12.0 ± 4.3	12.0 ± 4.2	0.66	0.511	10.9 ± 3.8	13.0 ± 4.4	-22.07	<0.001
重新关注计划	12.0 ± 4.3	12.0 ± 4.2	0.67	0.505	10.8 ± 3.8	13.1 ± 4.4	-23.40	<0.001
责难自己	10.4 ± 3.4	11.1 ± 3.0	-8.43	<0.001	11.2 ± 2.9	10.3 ± 3.4	11.67	<0.001
责难他人	8.9 ± 3.5	8.7 ± 3.3	1.88	0.061	9.2 ± 3.2	8.4 ± 3.6	10.22	<0.001
灾难化	8.1 ± 3.7	7.9 ± 3.6	2.79	0.005	8.2 ± 3.4	7.8 ± 3.9	4.91	<0.001
沉思	10.8 ± 4.1	11.4 ± 3.8	-6.16	<0.001	11.5 ± 3.7	10.8 ± 4.2	7.92	<0.001

2.2 CES-D 与 CERQ-C、ASLEC 得分的相关分析

CES-D 得分与 CERQ-C 的积极重新关注策略不相关($r=0.02$, $P=0.127$),与接受($r=-0.03$, $P=0.023$)、重新关注计划($r=-0.08$, $P<0.001$)和积极重新评价($r=-0.09$, $P<0.001$)呈负相关,与理性分析($r=0.15$, $P<0.001$)、灾难化($r=0.45$, $P<0.001$)、责难他人($r=0.33$, $P<0.001$)、沉思($r=0.31$, $P<0.001$)、责难自己($r=0.18$, $P<0.001$)呈正相关。因此,对于本研究样本来说,理性分析、灾难化、责难他人、沉思和责难自己为非适应性策略。CERQ-C 的非适应性策略得分为(38.6 ± 10.4)。CES-D 得分与 ASLEC 得分($r=0.48$, $P<$

0.001)和非适应性策略得分($r=0.43$, $P<0.001$)呈正相关。非适应性策略得分与 ASLEC 呈正相关($r=0.40$, $P<0.001$)。

2.3 非适应性策略对生活事件和抑郁的中介作用

以 CES-D 得分为因变量、ASLEC 得分为预测变量放入第 1 层,再把 CERQ-C 的非适应性策略放入第 2 层。结果发现,生活事件和非适应性策略能够预测抑郁。加入非适应性策略之后,模型调节后的 R^2 由 22.7% 提高到 29.7%,并且,生活事件的未标准化回归系数由 0.23 下降到 0.17,但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表 2 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抑郁的层次回归分析

步骤	预测变量	结果变量	<i>B</i>	<i>S. E</i>	β	<i>t</i>	R^2
第 1 步	生活事件	抑郁	0.23	0.01	0.48	45.67***	22.7%
第 2 步	生活事件	非适应性策略	0.25	0.01	0.40	37.04***	16.2%
第 3 步	生活事件	略	0.17	0.01	0.36	33.15***	29.7%
	非适应性策略	抑郁	0.22	0.01	0.29	26.58***	

注: *** $P < 0.001$ 。

以上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非适应性策略满足中介变量的条件^[10],因此,进一步将采用 Amos7.0 分析非适应性策略在负性生活事件和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

结果发现,生活事件到抑郁的路径系数为 0.48, $P < 0.05$; 加入非适应性策略之后,生活事件到抑郁的路径系数降低为 0.36, $P < 0.05$ 。生活事件到非适应性策略的路径系数为 0.41,非适应性策略到抑郁的路径系数为 0.29。0.41 与 0.29 的乘积为 0.12,即中介效应;生活事件作为预测变量对因变量抑郁的回归系数为 0.48,即总效应。中介效应与总效应的比值为 0.25,说明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5%。

3 讨 论

研究发现,有两个方面影响个体的抑郁:内在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如归因方式、自尊、依恋类型、应对方式等;外在因素如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等。本研究主要讨论应对策略和负性生活事件对中学生抑郁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提示中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者应该高度重视,以提高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与已有研究结果^[11]一致,本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有中等强度的正相关,说明个体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其抑郁水平就越高。调查发现,女性的抑郁情绪高于男性,其中一种解释认为,这是由于女性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比男性多^[12]。然而,本研究中女生的抑郁分数高于男生,但是男女生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并无显著性差异^[13],这说明不能仅仅用负性生活事件应激值来解释抑郁的性别差异问题。本研究还发现,高中生较初中生的负性生活事件应激值更高,也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症状,这可能是由于客观上高中生的升学压力比初中生大,

主观上体验到了更高的压力水平。

中学生使用最多的策略是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和接受,使用最少的是灾难化和责备他人,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1]一致。本研究结果与罗伏生等人^[3]的研究结果一致,初中生和高中生的理性分析得分与抑郁症状呈显著性正相关,而大学生的理性分析得分与抑郁呈显著性负相关,说明同样的认知应对策略对不同的个体确实有不同的作用。因此,可以认为,对本研究样本来讲,非适应性策略包括理性分析、灾难化、责难他人、沉思和责难自己。虽然非适应性策略的使用可能会引起个体的抑郁症状,而适应性策略可以缓冲不良生活事件对抑郁的作用,但是与 Jermann 等人^[14]研究结果一致,非适应性策略与抑郁的关系比适应性策略与抑郁的关系更为密切。这说明,虽然在经历负性生活事件之后,中学生更多使用适应性策略,较少使用非适应性策略,但是由于非适应性策略与抑郁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当同等程度使用适应性和非适应性策略时,非适应性策略对抑郁的作用更大,从而导致较高抑郁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非适应性策略在中学生生活事件和抑郁症状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生活事件通过两条通道影响中学生的抑郁症状:生活事件→抑郁;生活事件→非适应性策略→抑郁。这表明,生活事件不仅直接作用于抑郁症状,还通过非适应性策略的使用间接作用于抑郁症状,生活事件和非适应性策略的结合会进一步加重中学生的抑郁症状。使用非适应性策略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着极大的破坏作用,因此要求心理健康工作者不仅要重视减少青少年生活事件发生的频率,同时还要重视消除或减少中学生使用各种非适应性策略。

4 未来研究方向

由于生活事件、抑郁症状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的评定采用自我报告方式,可能会稍有偏差,因此,今后应该注意多种方法的结合使用,以期获得更准确、更有价值的研究结果。其次,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其结论不能推广到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与抑郁之间关系的发展进程。最后,由于本研究样本来自全国10个城市,其中主要是城市中学生,本研究结果能不能推广到农村中学生,还有待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Garnefski N, Kraaij V, Spinhoven P. Negative life events,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emotional problems[J]. Pers Individ Differ, 2001, 30(8): 1311-1327.
- [2] 刘启刚,李飞.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大学生生活事件和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 2007, 15(4): 397-398.
- [3] 罗伏生,王小凤,张珊明,等. 青少年情绪调节认知策略的特征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0, 18(1): 93-97.
- [4] 周丽,高玉峰,邱海棠,等. 留守初中生心理健康与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的关系[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8, 22(11): 796-801.
- [5] 魏义梅,张剑. 大学生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与抑郁的关系[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8, 16(6): 582-583.
- [6] 刘启刚,刘永贤.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大学生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间的作用分析[J]. 医学与社会, 2007, 20(8): 48-49.
- [7] 戴晓阳. 常用心理评估量表手册[M].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0: 138-140.
- [8] 刘贤臣,刘连启,杨杰.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信度效度检验[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97, 5(1): 34-36.
- [9] 朱熊兆,罗伏生,姚树桥,等.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的信效度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 15(2): 121-125.
- [10]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 36(5): 614-620.
- [11] 丁新华,王极盛. 中学生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关系[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2, 16(11): 788-790.
- [12] Garnefski N, Teerds J, Kraaij V, et al.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Difference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J]. Pers Individ Differ, 2004, 36: 267-276.
- [13] 刘贤臣,刘连启,李传琦,等. 青少年应激性生活事件和应对方式研究[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8, 12(1): 46-48.
- [14] Jermann F, Van der Linden M, d'Acremont M, et al.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CERQ)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French translation[J]. Eur J Psychol Assess, 2006, 22(2): 126-131.

编辑:赵志宇

2012-03-01 收稿